

偵察员的良心

9595529

45.52
C484



侦察员的良心

Покушение

А. Безуглов 著
Ю. Кларов

译自苏联《功勋丛刊》

1973年第2期

侦察员的良心

А. 别祖戈洛夫 著
〔苏〕 Ю. 克拉罗夫
宋 行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雅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4,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0

书号: 10071·471 定价: 0.6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通过对一起“纵火案”的侦破过程，反映了苏联三十年代中期“左”倾的政治气氛，以及在这种气氛的压力下，从上至下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的社会思潮。书中鞭挞了屈从于这种压力的怯懦者，也刻画了刚强正直不向压力低头的侦察科长形象。文笔细腻，人物富于个性。

象服从命令似的，我强迫自己睁开了眼睛，这才明白，是被收音机的声音惊醒了。就象夜间放在枕头底下的电话传来的轻微铃声对我的作用一样，铃声不知为什么吵不醒睡觉很轻的妻子，却会惊醒善于在任何喧闹声中熟睡的我，我会马上伸手拿过话筒：“我是别列茨基。”这常常使丽达感到惊讶。没办法，条件反射嘛。这是在刑事侦察处养成的习惯之一。类似的习惯很多，如惯于经常保持高度警惕并迅速作出反应，惯于记下见过的人的特征，惯于记住发生的一切，惯于对任何行为动机进行细致的分析——不仅对他人的，而且也对自己的……这些习惯虽然对工作很有帮助，但却往往给自己的所谓个人生活造成困难。

房间里很暗，广播员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低沉而清晰：

“……阶级敌人还没有消灭。我们要象在战场上保卫军旗那样，保卫我们领袖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不仅属于他们自己，而且属于整个国家，属于苏联和全世界工人阶级……”

我闭上眼睛，而后再睁开。这才看到挂着窗帘的结了冰的窗子露出了一角。透过这一角看到一盏灯闪着黄光，而后又是一盏。这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我伸手到床旁椅子上摸起纸烟，借火柴的光亮看了看表：六点十分。由于深吸了一口烟，头有些晕。广播员的话仍在轻轻地回荡：“万恶的凶手夺走当代一位优秀人物的生命，无产阶级法庭的巨手必将拧下他的头。”

我灭掉未吸完的纸烟，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收音机还在响：

“刚才播送的是今天报上发表的劳动人民的信。现在请听昨天晚上间的广播节目……”

我关上收音机，打开了窗子。寒风把散落在地板上的报纸吹得沙沙作响。房间需要收拾一下了。到处是烟头、报纸、垃圾……可是收拾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当汽车来接我时，我已经穿好了大衣。

我看到捷斯连科正照例地围着汽车转圈，一面用脚踢着轮胎。他是流浪儿出身，所以对刑事侦察处工作人员格外尊敬。

“早安，首长同志。”他精神抖擞地说，一面打开了车门。

“你好。只是早晨不太平安。”

“是的，”捷斯连科同意说，“好消息很少。简直没有什么好消息。什么时候下葬，六点吗？”

“六点。”

“放在克里姆林宫墙里吗？”

“是的。”

我不想再谈话，捷斯连科明白这一点。他没有再向我提问题。只是在莫斯科民警局大楼前停下车时说：

“等您吗？”

“不用。请你九点再来。早了我完不了事。”

紧靠民警局大院铁栏杆旁边停着笨重的卡车和敞篷汽车。周围聚集着参加中心地区封锁的值勤人员：民警特勤战士，民警第二与第五大队战士。稍远些，在彼得洛夫大门旁，各分局民警队已经列好队。

从民警局大楼楼顶垂下镶黑边的红旗。沿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横幅。

我在楼道里碰上了处值班员侦察组长鲁辛诺夫。这个身材瘦长、行动拙笨的人正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前，用手帕仔细地擦着眼镜。

“您好，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您在等我吗？”

鲁辛诺夫眯起突起的近视眼，困窘地笑了笑。不戴眼镜时他总是感到很不自在。显然，我的到来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我过一会儿才能来。鲁辛诺夫急忙把眼镜戴到自己那不争气的塌鼻梁上，作了个立正姿势，和我握了握手。

“您好，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又没睡足吧？”

“跟平时一样。”

“我早晨只睡了两小时。可是我觉得自己简直就象一头坐上摩托车的狮子。”

“精神饱满，但并不愉快，是吗？”

“一点不错。”

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尽管在民警机关已经服务多年，但还完全是一副文职人员的样子。这表现在一切方面：他在用语、习惯、举止，特别是衣着方面都不象个军人。他身上的制服显得有些臃肿，马裤后面象挂了个袋子。再加上他那不大坚定的步伐，微微的驼背和不断扶眼镜的动作，都不象个军人，难怪队列教官在操练时，一见到鲁辛诺夫就大发雷霆。他说：

“真让我头疼。他甚至不会象正常人那样走路。《星火》报道：功勋演员叶琳娜·果戈列娃和米哈伊尔·列宁通过了‘伏罗希洛夫之箭’奖章测验。何况鲁辛诺夫不是小剧院的演员，而是在民警局服务……”

确实，鲁辛诺夫的军容实在无法令人满意，他是处里“伏罗希洛夫之箭”野外科目不及格的唯一工作人员。但是我总认为，业务人员的素质不能只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当遇到需要深入分析的复杂案件时，我总是交给鲁辛诺夫或另一个侦察组长爱尔利赫。他们二位被公认是全处的“智囊”。爱尔利赫的特点是坚毅和狡黠，但是由于习惯，也可能由于个人感情，我还是喜欢鲁辛诺夫，尽管同他一起工作要困难得多——刑事侦察处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有辉煌的胜利，而且也有过偶然的失算。

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他的灵活而富于批判能力的头脑往往太过分，以致有时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并且相持不下。

我一直记得他所作的关于一个女大学生被暗杀的报告。

鲁辛诺夫出色地分析了全部罪证，就象二乘二等于四那样，证明凶手是一个名叫齐奇金的人。这是如此明显，以致不得不令人惊异，为什么由最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的侦破小组竟然费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也没弄清。我和在场的爱尔利赫都听得入了迷。但当我要签署齐奇金的拘留证时，鲁辛诺夫说：“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而从另一个方面……”他又用令人信服的逻辑论证，为什么尽管有全部证据，齐奇金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杀死这个姑娘。“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呢？”我问。“从一个方面来看——是，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是，”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忧郁地回答说，并且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是的，他自己也不满意，但结果就是这样。

这种论证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惊人能力不仅使我大伤脑筋，而且也使鲁辛诺夫自己伤透了脑筋。可是他对自己毫无办法。

除武装袭击伊兹麦洛夫食品店的看门人一案外，这一夜没有发生任何刑事案件。

我问鲁辛诺夫到出事地点去过没有。

“没有，不需要了，”他说，“罪证俱全。”全部三名罪犯都被民警分局的人抓住了。在一个人身上搜出了勃朗宁手枪，另一个身上搜出了撬棍。是卡卢加来的惯犯。

“都供认了吗？”

“供认了。”

这就是说，这件刑事案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案子很简单，因此，可以由区民警局刑事侦察处或民警局有关业务部

门去办。这样更好些。

“还有什么事？”

“市检察院来过电话。”

“谁？”

“打听谋杀沙姆莱未遂案的材料。我告诉他最好直接找您或苏霍鲁科夫。”

“他为什么需要这些材料，没说吗？”

“完全没有，”鲁辛诺夫回答。

消息是不愉快的，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对此十分清楚。沙姆莱一案是他调查的，没有得出结果，而且被迫终止了调查工作。袭击这位经理的动机（沙姆莱领导莫斯科一家大托拉斯）一直无法解释。由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搁置这一案件自然会引起检察机关的一定反响。

“可是终止调查的命令已经撤消，案子转给爱尔利赫了。”鲁辛诺夫说。他善于猜透别人的心思，他这种能力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愉快。

“从一个方面来说是这样，”我说。

符谢沃罗德·费奥克季斯托维奇红了一下脸，但还是问了一句：

“而从另一个方面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用笔写下的，用斧子也砍不掉。命令是有，上面有我们的签字。而且取消这项命令刚刚一个星期。”

“啊，爱尔利赫会成功的……”

我不喜欢鲁辛诺夫的声调。但是注意分辨下级人员声调

中的细微差别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且鲁辛诺夫与爱尔利赫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反映到工作上，那是他们的私事。但鲁辛诺夫根本不应该讽刺别人，是他把调查工作引进了死胡同。我要处在他的位置上，遇到这种情况，决不会这样做。

鲁辛诺夫把几夹卷宗放到桌上。我不在科里才一天。可是文件已经堆了很多，特别是书面调查材料。在五十来份要求、申请和通知上签过字后，我拿起一大卷“内部资料”。

其中大多数文件上有意味深长的标注：“备查”。从公文语言译成普通俄语的意思是，可看可不看。可我还是决定看。

我看了关于在搜查中查出的贵重物品交存办法的说明；关于粮食补贴范围和一级民警人员工资的消息；关于干部工人化的通知……

一直望着我的鲁辛诺夫从卷宗中抽出几张别在一起的卷烟纸。

“您来不及全读，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这是什么？”

“刑事侦察处各科竞赛公约草案。发下来讨论的。”

“谁起草的？”

“总局的人，我们这儿阿廖沙·波波维奇参加了。他比所有的人都关心……”

这个草案与过去的没有多大区别。起草人建议竞赛参加者缩短调查时间，减少退回案件补充侦察和把总破案率提高到80%。积极的工作人员破案率不得低于45%。无结果搜查应减少20%。接着谈到扩大党团员成分，吸引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社会工作，文教工作者的作用，然后又是百分比。“百分之

几”的字样每行里都要出现几次。整个草案好像是会计报表。

“要求您写出书面意见，”鲁辛诺夫说。

“这能有什么意见呢？侦察工作不是会计结账。当然是愚蠢的。”

“就这样写吗？”

“您这样写：‘新的竞赛公约草案无疑比过去的方案有了很大进步。感到起草人全面概括并深刻分析了实际工作情况……不过，考虑到与草案质量完全无关但却可能把整个侦察工作引入歧途的某些次要的缺陷，我们坚决反对其实行……’这一类的话。明白吗？”

“明白，首长同志。”

“那就去办吧。阿廖沙·波波维奇在这儿吗？”

“在。整夜都在。”

二

阿列克谢·富法耶夫在民警局监察组工作快一年了。我过去就认识他。是丽达介绍的。丽达在列宁格勒时，不知是在青年刊物《少年无产者》艺术部还是在编辑部曾同他一起工作过。此外，听丽达说，富法耶夫会唱老共青团歌，而且唱得很好，“纳尔瓦哨所，普基洛夫工厂——有个小伙子在那里工作，年纪大约二十一岁……”

“总之，你们会合得来，”当时她说，不知为什么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都叫他阿廖沙·波波维奇……”

我同富法耶夫一直没有深交，可是每次在局里相遇总象

老朋友见面似的。而“阿廖沙·波波维奇”的外号也就从我这儿传开了。所有的人都这样叫他，从助理侦察员直到刑事侦察处处长苏霍鲁科夫。

富法耶夫，前额宽阔，浅黄头发，双肩下溜而有力，两只明亮的蓝眼睛带着一副天真而狡黠的神情，简直同民间木版画上的阿廖沙·波波维奇一模一样。在他那低沉的歌唱般的声音中，也带有一些壮士歌的味道。

富法耶夫的工作精力是令人羡慕的。不眠之夜对他毫无影响。就是现在，也显得精神抖擞，好象刚刚安安静静地睡足了觉。

当我走进来时，他看了看表。

“你太性急了，别列茨基。还差七分钟呢。我这就写完。你先看看报。也许，你不常看报吧？”

“得空就看看。”

“啊，这不象话。这回算你走运，就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你别说话，我也不听。请坐，请你坐在那把椅子上，它软和点，让自己的骨头舒服舒服，再读读报纸吧……”

富法耶夫用他惯有的作风，亲切地劝说着我。他对局里所有的同事讲话都用这种态度。对一些人用父亲般的态度，对另一些人用兄弟般的态度，而对某些人也用晚辈的态度。对我这个刑事侦察处的一名主要科长，他保持兄弟般的态度，可是现在从他的声调中流露出一种父亲般的语气。考虑到新年以来监察组结构的变化，从这一点上可以得出某种结论。

“听说，刑事侦察处和外勤处的工作以后都由你负责监

督了？”我忍不住了。

“都那么说，都那么说……”富法耶夫发出歌唱般的声音，眼睛并没有离开他面前的那张纸。“让他们说去吧……”他递给我一张报纸。“好了。安静一会儿。”

我在靠窗的一张皮靠背椅上坐下来，开始吸烟。

“呶，你看，”富法耶夫不满地说，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马上冒起烟来了！你可以在汽车里抽个够。”

我把纸烟扔到半开的小窗子外面，打开了报纸。

第一版上都是信——对基洛夫被害的反应。上面是粗体字印的，“红色猎人厂”工人致党中央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下面是基洛夫逝世情况公报。

我注意到用红铅笔勾出的一则不大的简讯。其中报道，“因国家安全保卫疏忽罪”对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民警局长梅德维季为首的列宁格勒契卡小组提起公诉。在逮捕的人中，有的我在彼得堡刑事侦察处第一大队服务时见过，有的听说过。对梅德维季我比较熟悉。他曾经代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授予我荣誉武器。几年前我曾陪同他视察过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和北方特别任务营管理局下属各单位。

“看到梅德维季的事了吗？”富法耶夫放下笔说。

“看过了。”

“这才对，”他用教训的口吻说，“好，走吧。”

他迅速把纸分别放进写字台的几个抽屉，从保险柜里取出勃朗宁手枪，放进裤子的后兜里。

“这干什么用？”

“这也不碍事，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在汽车里他坐在司机身旁，把司机挤到了门边。捷斯连科“啊”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穿过中心还是沿萨多沃姆走？”捷斯连科问。

“走林荫道，”富法耶夫用坚决的口气说。

我们很顺利地到达斯列金山，但不得不在这儿停下来，等待“狄纳莫”、“斗士”和“无产者劳动”工厂的工人队伍通过。

人们一声不响，整齐地走着。忧伤的面孔冻得发木。一个大胡子高个儿老头捧着用松树枝围起的基洛夫的巨幅肖像。

基洛夫微笑着。嘴唇、眯起的眼睛都在笑。他那善良的圆脸上布满了愉快的皱纹。

在队伍的末尾响着吹奏乐。“你们忠于人民，热爱人民，在斗争中牺牲……”音乐嘎然停止了，象开始一样突然。于是又只是千百人沉重的脚步声。

“旗杆多亮！镀了金的……”富法耶夫在拥挤的座位上轻轻地转过身来说，“而我那份镀铜的申请在后勤处已经压了半年。毫无结果。以后得让‘轻骑兵’的小伙子们去对付他们。一点小事，也得大费周折。”

“请你别说了。”我建议。

从队伍中走出一个人，穿着棉衣，走近汽车旁边要烟吸。我把烟盒递给了他。

“我要拿三支，您不见怪吧？”

“拿吧。”

他用冻僵的手指从烟盒中拿了几支烟，自顾自地说，

“这不，去迎接基洛夫。迎 来再送 走……就这么回事……你们也是去那儿吗？”

“还能去哪儿呢？”捷斯连科说。

“是去作保卫工作吗？”这位工人笑了，“应该早点。现在还有什么可保卫的？死人是不怕子弹的。”

队伍终于过完，捷斯连科发动了马达。汽车猛一开把我的帽子甩掉了。富法耶夫骂了一句。

“照这样走法，咱们到不了。”

“没事，到得了，”捷斯连科说。

捷斯连科在正在施工的地铁坑道旁也没有减速，一下子转到了米亚斯尼茨大街。这条街没人。既没有马车、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是沿人行道有两排长长的深灰色横队，那是民警特勤战士。一个个身材魁梧，头戴钢盔，穿着白钮扣的军大衣，就象是孪生兄弟。

在离卡兰切夫广场（一年半前改名共青团广场）不远的地方，哨兵拦住了我们，车不准再往前开。

“中心封锁区指挥员的命令。”执行巡逻队长职责的骑兵团副营长对富法耶夫说，“十分钟以前我们可以放您过去。现在不行了。您可以设法穿胡同，到列宁格勒车站……”

浪费时间去绕道没有必要。我们下了汽车，让捷斯连科回车库，好在广场已经很近了。

“有多少人呀！”富法耶夫惊讶地说。

真的，巨大的广场上挤满了工人和红军军人。更令人惊奇的是这里一片肃静。既没有喧闹声，也没有电车铃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微弱的，若断若续的，拖得长

长的。喀山车站的大楼旁燃着篝火。刺鼻的黑烟笼罩着低矮的雪堆，散发出糊味和重油味。两个少年把从路旁石柱上撕下的广告扔进火堆。孩子们脸上现出一副不满意而又专注的神情，就好象人们在做不愉快的但却必要的工作时那样。

塔上的大钟指到九点半。

“准时到达，”富法耶夫满意地说，“你坐苏霍鲁科夫的车回局里吧？”

“可能。”

“回头我会找到你们。祝你平安！”他对我摆了摆手，消失在人群中。

检查了列宁格勒车站附近归我管的外封锁区，我向入口走去，内务委员部的人都在那里。

莫斯科民警局长、副局长和苏霍鲁科夫站在一边，谈着什么。三人都穿着制服。

见我走近，他们停止了谈话。

“可以报告吗？”

“呶？”民警局长用疑问的口气说。

我简短报告了检查结果。

“内封锁区检查了吗？”

“没有，检查内封锁区规定应在十点十分。”

“请您马上去检查。我现在到月台上去，回头您向苏霍鲁科夫或外勤处长报告。”

当我从车站大楼出来时，局长和副局长都已不在，只有苏霍鲁科夫一个人。他用自己喜欢的姿势站着：两腿稍稍分开，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他的脸色冻得发白，目光一动不